

專輯論文

從「天下」到「國家」： 清末語言運動中的「聲音」和言語文化¹

黃華

摘要

清末切音字運動、言語文化的興起，意味着受到漢字·漢文壓抑的聲音逐漸浮出了歷史地表。本文主要探討以下問題：為何聲音在清末受到重視，言語文化繁榮的背後隱藏着怎樣的社會隱喻，聲音中心主義如何與國族建構過程交織在一起。本文認為：從「天下」到「國家」的轉變過程中，傳播情境的變化使得聲音參與到信息邊界的重構。聲音文化的繁榮切合了當時急切擺脫落後狀態的求快衝動。聲音中心主義造成語言和文字的斷裂，由此國族建構與傳統日益疏離，「新民」僅是一種基於工具性的塑造

關鍵詞：天下、國家、聲音、語音中心主義、傳播情境

黃華，福建師範大學傳播學院講師。研究興趣為媒介史。電郵：huanghua2005@yeah.net

論文投稿日期：2013年9月16日。論文接受日期：2014年2月27日。

Special Issue Article

From “the World” to “Nation-State”: The “Voice” and Speech Culture in the Language Movement of Late Qing

Hua HUANG

Abstract

The Phoneticization Movement and speech culture were launched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Voices repressed by Hanzi and Hanwen gradually came to the surface of history. This research explores why people paid attention to the voi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cluding what kind of social metaphors were hidden behind the prosperity of speech culture, and how phonocentrism became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nation-state.” This research reveals that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world” to the “nation-state,” communication changed in three dimensions and voice participated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formation boundary. The rise of speech culture was, to some extent, an imitation of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More importantly, it conformed to the “kuai” consciousness. Phonocentrism led to the cleavage between the modern written language and the classical language;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state” was lacking in reliable contact with the tradi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Xinmin” served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political groups.

Hua HUANG (lecturer).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 media history.

Keywords: the World, nation-state, voice, phonocentrism, communication situation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Huang, H. (2014). From “the world” to “nation-state”: The “voice” and speech culture in the language movement of late Qing.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9, 207–233.

盧憲章在1892年刊行《一目了然初階》，正式拉開了清末切音字運動的序幕。從1892年到1910年將近二十年的時間裏，共有27種切音字方案問世，絕大部分是在1895年之後產生(王東傑，2010)。切音字，是一種拼音文字，又叫「快字」、「簡字」、「拼音字」等。在1900年以前，切音字主要是以方音為標準，這一階段強調的是「言文一致」。到了1900年以後，官話音方案開始大量出現，連福建人盧憲章也不甘人後，在1906年提出「頒定京音官話，以統一天下之語言也」，在清末最後十年裏「統一語言」、「國語」的呼聲愈來愈高。無論是「言文一致」，還是「統一語言」，都在強調「聲音」的重要性。

在漢字·漢語系統中，「聲音」受漢字「歸化」，是一種隱匿的存在方式，兩者並未截然分開來，而是形成一個模糊的整體。在漢字·漢語系統中，「語」、「言」、「言語」、「語言」都和「文字」不可離析。西方人以說話發聲為本質而排斥文字書寫的那個整體性「語言」概念，在中國語言傳統中並無對應的名稱。最重要的是在「語」、「言」和「文」、「字」這些概念之上，並不存在一個更大更高的清晰的概念來涵攝一切(郇元寶，2010)。在索緒爾(1999：47-48)看來，「語言學的對象不是書寫的詞和口說的詞的結合，而是由後者單獨構成的」，他的意圖是為了把語言(聲音)從文字的僭越中拯救出來。在談到漢語時，他指出(1999：51)：「對漢人來說，表意字和口說的詞都是觀念的符號；在他們看來，文字就是第二語言。在談話中，如果有兩個口說的詞發音相同，他們有時就求助於書寫的詞來說明他們的思想。但是這種代替因為可能是絕對的，所以不致象在我們的文字裏那樣引起令人煩惱的後果。漢語各種方言表示同一觀念的詞都可以用相同的書寫符號。」簡而言之，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並不適用於漢字系統。

西方的表音體系則不同，在柏拉圖那裏就已經明確了「聲音」對「文字」的優勢地位，「討論中的邏各斯」的等級高於「寫成文字的邏各斯」。聲音的「形式主義的純粹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擺脫類似於文字的形體化的干擾，更能代表真理的「在場」。而文字則是聲音的替補、派生物，是符號的符號，它的存在「威脅着呼吸、精神，威脅着作為精神的自我關聯的歷史。」(德里達，1999：34)對「真理」的孜孜以求，是西方思想的動力性因素，為了抵達觀念的位所，而忽視了介質的存在，

割裂了能指和所指。因此在許多西方哲人看來，如洪堡就認為非拼音文字「不能完美地執行語言的解析功能」，黑格爾就認為象形文字是「聾子的閱讀和啞巴的書寫」。所以，西方思維注重的是切割和分析，而中國則偏向於調和與移情（弗蘭索瓦·于蓮，2009）。

到了清末，人們突然發現，聲音語和文字語竟然有如此可怕的分離，中國廣大區域「各操土語」，互不溝通，身處異地如在「異國」。在此前上千年的歷史中，「土語」各異並不妨礙王朝體系內部的溝通，因為僅僅憑藉漢字、文言系統就可整合起帝國體系（趙鼎新，2006）。雖然也有南方一些官員因不通官話造成溝通上的困難，但朝廷上下以漢文為媒介即可傳遞信息，方言問題就被忽視了。²所以，在清末最後十來年時間，「聲音」為何會作為「漢字」的對立面被單獨強調，為儒家文化的傳佈和綿延提供物質基礎條件的漢字·漢文在清末為何開始失效，為何會形成一股以講報、戲曲、音樂、演說、白話等形式展示的「聲音」的文化（統稱為「言語文化」），以及「聲音中心主義」如何與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交織在一起。這是本文需要探討的問題。

從「天下」到「國家」：「聲音」的釋放

作為「宇宙之冠冕」的漢字·漢文，它的神聖性和「天下」觀念是交融在一起的。那麼，何為「天下」？約瑟夫·列文森（2000：84）指出：「『天下』的含義是『（中國的）帝國』，換言之，亦即『世界』。所以『天下』意味着中國即世界。」「天下觀」實際上是一種「文化至上主義」的觀念，以儒家文化為宗，在文化主張上是排他的，但在文化邊界的設定上是包容的，以夏變夷，顯示文化的「威儀」（金觀濤、劉青峰，2009）。所以，「天下觀」強調的是同一性而非差異，是同化而非接納異質文化。而若要長期維持中心和邊緣的文化關係，就需要控制文化內部的各個要素之間的流動，以及嚴格警惕和拒斥來自異文化的「侵襲」。若把「天下」看成是一個系統，外部信息被禁止流入，意味着系統中由信息的缺失所引起的熵的增加，可由系統內部各要素自由度的喪失予以消除（陳衛星，2008），但長此以往導致的是自我更新基本處於停滯的狀態。

漢字·漢文作為同一文化圈內被唯一認可的書寫媒介，在其中扮演「基礎性硬件」的功能作用，承擔文化在時間上的接續和信息在空間上有限傳佈的職責。它之所以能夠長期存在於王朝國家之中，也正是因為符合了封閉、自足的系統內部信息流動速率和邊界限定的要求。梁啟超(1958：8)早年就提到：「中國文字能達於上，不能達於下」。識習漢字·漢文耗費的漫長光陰為一般民眾進入士階層設定了較高的文化門檻，維護了精英階層的「知識壟斷」。再者，少數人經過多年科考到達廟堂之上，又控制了社會流動的規模。因而，信息以書面、文言文形式在士階層內部的流通，「文人與眾人如兩世界」(王照，1958：19)，將士農工商各個階層限定在各自的活動區域，相互隔絕，從而維持「天下」體系的正常運行。

漢字·漢文是偏向時間的媒介，以衍形為主，自身形體的固定化使之難以「與時俱進」，卻能較好地保存舊有的文化形態。梁啟超(1994：78)在《新民說》中對衍形文字的「弊端」做了論述：

故衍聲之國，言文常可以相合；衍形之國，言文必日以相離。社會之變遷日繁，其新現象、新名詞必日出，或從積累而得，或從變換而來，故數千年前一鄉一國之文字，必不能舉數千年後萬流匯運、群族紛拏時代之名物意境而盡載之盡描之，此無何如者也。

可以做此設想：倘若字隨音變，在中國遼闊的區域內方言駁雜，如何以「音」來統合「天下」。「音」因時因地之變，又如何能保證「天下」的長久恒定。在這個意義上，漢字·漢文的時間偏向和「天下」講求超穩定性的特質是相符的。「一種媒介經過長期使用之後，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它傳播的知識特徵。也許可以說，它無孔不入的影響創造出來的文明，最終難以保存其活力和靈活性。」(哈羅德·英尼斯，2003：28)媒介鍛造了人們的時空感知，反過來又強化了這一文明的「惰性」。在由媒介搭建的「鏡像」中，人們如那喀索斯般迷戀鏡面反射出的「倒影」，自戀式麻木使之認定媒介是自然的存在。(麥克盧漢，2000：360)所以在長時間裏，漢字·漢文作為「日用而不知之物」，人們絲毫不會去質疑它存在的合理性。更何況，漢字·漢文自身還是人們膜拜的「聖物」。

所以，雖然方言各異是顯見的事實，但「聲音」的存在一直被「壓抑」。原因有三：其一，人們進行自我催眠，將漢字·漢文的存在視為理所當然，這種「自戀式麻木」的狀態妨礙了對其它媒介的認知。其二，「聲音」是多樣的，是一種流動性強、意義模糊多變、無法進行壟斷的傳播方式，蘊藏着叛逆顛覆的危險（吳予敏，2001；李慶林，2006）。「聲音」的多樣性、異質性乃至是潛在的危險，被漢字·漢文「收編」和整合，以維持「天下」體系的秩序。其三，「聲音」按照杜威的解釋，是一種聽覺文化，意味着「參與」（詹姆斯·凱瑞，2005）。但在「天下」體系內部，冷靜的「旁觀」代替了熱情的「參與」，這樣才能抑制系統內部各要素的活躍程度。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的「天下觀」受到來自泰西的「國家觀」的競爭，不斷趨於下風。在這個過程中，條約體系的建立，漢字·漢文的地位在逐漸陷落。但清政府還要維持表面的榮耀，將外語學校定名為「同文」或者「廣方言館」。³這種命名方式，一方面體現了清政府的「虛驕」，另一方面則是人們還依然以「天下觀」的姿態來辨別對外關係（陳旭麓，1992；熊月之，2011）。封閉的「天下」體系，無法拒斥來自外來系統的武力侵略，自身又喪失更新能力，只能「自欺欺人」地在想像的自足中保持最後的「體面」。尤其在甲午之後的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都處於加速度轉變的狀態。「快」的體驗和急迫促逼着志士們尋找現實困境的出路。在內外交困的情境之下，中國的「天下」不得不向「國家」「屈服」，如列文森（2000）認為的從文化主義到民族主義的轉變。

金觀濤、劉青峰（2009：242）指出：「在1895至1899這四年間，『天下』這個詞的使用達到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高峰，而『國家』一詞的使用，也是在1895年後突然增加了，『民族』一詞的使用則到1900年後才開始井噴之勢。1900年以後『天下』一詞的使用次數急遽減少，『民族』一詞急遽增加，這在19世紀是難以想像的。」「國家」、「民族」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出現頻次之高，可以反映出它們已經作為一種新的概念工具和思想資源進入志士們的思考視野。而切音字運動呈上升狀態，也是在1895年之後。

從「天下」到「國家」的轉變過程中，傳播情境發生了三重變化：一是對「民眾」的發現。王照(1958：20)稱：「余今奉告當道者，富強治理，在各精其業、各擴其職、各知其分之齊氓，不在少數之英雋也。」梁啟超(1994：1-2)則言：「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脈、血輪也。……則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長生久視，則攝生之術不可不明，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伴隨着對民眾的發現，就開始了將原先是「天下」的臣民、部民改造成「國民」、「新民」的啟蒙運動。「1900年代開啟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走向人民』運動，在本質上是一次思想、文化和社會的改良運動，具有強烈的啟蒙意義。」(李孝悌，2001：247)

二是晚清志士們不得不接受中國不是世界的中心這一既成事實，開始從政治利害關係而非文化道德的角度去審視國家間的關係。早先的優越心理和現實情境的反差，又迫使他們急切尋找一種能夠快速治癒病痛的「快」媒介。推行切音字運動的一個「強勢」理由，即能迅速改變落後狀態。盧戇章1892年出版的《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其書名就有一個「快」字；蔡錫勇的《傳音快字》，也有「快」字。勞乃宣(1957：347)：「此字傳習極易，至多不過數月而成。以一人授五十人，計之一傳；而五十人再傳而二千五百人；三傳而十二萬五千人；四傳而六百二十五萬人；五傳而三萬一千二百五十萬人。中國四萬萬人五六傳而可。」對「快」的追求，折射出志士們從文化走向政治、從天下觀走向國家觀的心理調適過程中，實用主義傾向日益佔據上風。

三是信息流通速度加快，危機時局的促逼需要打破上下、內外的區隔，使得民眾既能通國事、民情亦能達於廟堂。在產生、傳遞和接受信息的三個環節中，有一個互相適應的過程。當媒介自身無法承載信息流量的膨脹、流通速度以及信息要突破此前設定的邊界的時候，人們自然會轉向新的替代性媒介，或者對舊媒介的結構進行調整，重新恢復一種社會平衡(陳衛星，2008)。

早在切音字運動之前，伴隨着條約體系而來的外國傳教士的活動，他們就已經使用羅馬拼音來拼寫方言，並且用方言出版了大量宗教性書籍(熊月之，2011；游汝傑，2002)。在傳教士看來，漢字·漢

文的繁難是造成中國落後的原因之一，這一觀點在後來切音字運動的支持者那裏得到了強調。將文字與國家強弱掛起鉤來，本是傳教士的見解，卻很快由中國人主動說出並且相當認同，體現了在船堅炮利的軍事侵略之下中西文化的權勢開始發生轉移（王東傑，2009；羅志田，1995）。「言文一致」早在黃遵憲於1887年完成的《日本國誌》一書中就已經提及，但到了甲午之後才廣為人知。在這不到十年的時間積蓄中，傳播情境的複雜化，呼喚一個新的傳播體系以適應社會的變化。在這個意義上說，發現「聲音語」和「文字語」的嚴重分離，不能排除此前傳教士的羅馬字實踐的影響，也不能對日本的「言文一致」運動視而不見；但更為重要的是從「天下」到「國家」轉變的過程中，依然保持原有傳播狀態的漢字，漢文已經無法跟上傳播情境的變化，需要重新劃定一個新的、能夠維持社會共同體有效運作的信息邊界。

聲音文化的「社會隱喻」

從「天下」到「國家」的轉變過程中，釋放了能夠突破已有信息邊界的「聲音」。但「聲音」在文字當中的展示卻被限定了範圍，切音字運動只是一場面向下層民眾的語言運動。在這些推行者看來，漢字繁難，下層民眾難以掌握，它們是士林之專有物。設定另一種文字是不得已的選擇，絕對不能威脅到漢字的權威。桐鄉都鴻藻（1909：38）就認為：

簡字之設，所以為無量數窮民謀毛褐粗糲。毛褐粗糲，其力固不足以廢文繡膾炙也。……創設簡字者，必無廢漢字之心。簡字大行其力，亦必不足以廢漢字。（〈簡字利弊說〉，《浙江教育官報》，1909，8）

簡字只是「毛褐粗糲」，漢字則是「文繡膾炙」，前者是知識階層對下層民眾的「施捨」。即便如此，「聲音」的影響遠遠超越了切音字運動，1900年代興起了以演講、戲曲、音樂等諸多形式的「言語文化」。

《警鐘日報》在1904、1905年間就曾多次報道了各地興辦講演會、戲曲改良會等情況，如登載〈戲劇改良會開辦簡章〉、〈紹興戲曲改良會簡章〉等專件（1904年8月7日；8月8日）。記有蘇州「同裏組織音樂會」

(1904年8月16日)，上海「紀續演瓜種蘭因新劇」(1904年8月16日)，吳淞「記玫瑰花新戲」(1904年9月3日)，埭溪蔡綠農添設講演小說以及教授唱歌(1904年11月21日；11月23日；12月30日)，衢州的宣講會(1904年12月11日)，保定設茶話所(1904年12月12日)，嵯邑「練習演說會之發達」[以喚起國民思想，開通下流社會](1904年11月9日)等。「祝演說之前途」則記在沙頭社學演說時的盛況，還稱「到處演說以開風氣，其功效之大，何可限量」(1904年8月23日)，足可見當時「言語文化」之盛。那為何「聲音」在清末突然繁榮起來，它在塑造「新民」的過程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從聲音的媒介特質來看，其一，受空間的物理和文化環境限制。在清末演說、宣講、講報一般發生在茶館、戲院等人群較為密集的地方，或者獨辟專門的場所如講報處、宣講所等等。在此類空間中，市井百姓佔了多數。所以，空間的有限、嘈雜，文化的區隔，需要簡單、淺顯的話語才能便於民眾理解。演說者儘量使用套語，重複的力量遠勝於理性的說服。

其二，聲音難以「保存」，無法脫離「當時當下」的情境，所以在演講過程中更為注重情緒的渲染，聽者現場的「情感投入」程度和演說的說服效果有很大聯繫。亞里士多德(2004：151)就曾指出：「當聽眾的情感被演說打動的時候，演說者可以利用聽眾的心理來產生說服的效力。」《警鐘日報》記錄某演說情形時提到：「到聽者幾及千人。座中多有泣下者。異日鄉中農民復請演說，感泣如初」，後又記王君痛陳纏足之害，「聽者泣不可抑。即晚放足者凡七人，其影響之捷如此。」(《警鐘日報》，1904年8月23日)

再有，相對於文字對個體理性的挖掘、擴展主體性、由知識的獨立引發邏輯上的爭論和懷疑主義不同的是，聲音不會提供足夠的時間讓聽者去「回味」。聲音的「轉瞬即逝」，用口號式的傳誦、富有韻律的口頭詩，乃至斷語取代邏輯上的嚴密和精準，以此延續聲音消失之後的效力。(保羅·康納頓，2000；翁，2008)清末的講演似乎復活了口語傳播時代「集體記憶」的特點。

其三，聲音是一種表達和接收的「統覺」體系。演說者的在場表現，體態、聲音、語調等各方面觸覺、聽覺、視覺的糅合，直接影響

到聽者的情緒。《警鐘日報》就載有衢州的「江山院演會」（1904年12月11日）：演說者「至此不覺萬箭擬心，嗚咽不能放聲，時在座父老亦有為之動容者」。翁（2008：51）就認為，「口語詞一定會受到總體生存環境的修正，而總體生存環境總是需要身體的參與」，身體運動自然而然地和聲音同時展現。

由上而知，聲音媒介具有非理性和鼓動色彩，而聲音的傳播效果在清末知識階層那裏早已有所識見。梁啟超（1996：281，282）就感歎：「聲音之道德人深矣」，「聞學生某君入東京音樂學校，專研究樂學，余喜無量。蓋欲改造國民之品質，則詩歌、音樂為精神之一要件，此稍有識者所能知也」，「頃讀雜誌《江蘇》，屢陳中國音樂改良之義，其第七號已譜出軍歌、學校歌數闕，讀之拍案叫絕，此中國文學復興之先河也」。梁啟超在此所指「某君」為當時就讀於東京音樂學校的曾志忝，他在《江蘇》上發表了〈樂理大意〉和〈唱歌之教授法與說明〉兩篇文章（夏曉虹，2006：96-97）。

梁啟超（1996：282）指出：「自明以前，文學家多通音律，而無論雅樂、劇曲，大率皆由士大夫主持之，雖或衰靡，而俚俗猶不至於太甚。本朝以來，則音律之學，士大夫無復過問，而先王樂教，乃全委諸教坊優伎之手矣。」故中國之詞章家，於國民無絲毫之影響，原因在於詩樂二分。「然樂也者，人情所不能免，人道所不能廢也」，將「耳的詩」全委諸俗伶之手，「移風易俗之大權遂為市井無賴所握，故今後言社會改良者，則雅樂、俗劇兩方面，其不可偏廢也」（梁啟超，1906：80）。

歐榘甲（1996：52，56）在〈觀戲記〉中言：「記者又嘗遊日本矣，觀其所演之劇，……其激發國民愛國之精神，乃如斯其速哉？勝於千萬演說台多矣！……勝於千萬報章多矣」，「演戲之移易人志，直如鏡之照物，靛之染衣，無所遁脫。論世者謂學術有左右世界之力；若演戲者，豈非左右一國之力者哉？中國不欲振興則已，欲振興可不於演戲加之意乎？加之意奈何？一曰改班本，二曰改樂器。」陳獨秀（1993：89）在〈論戲曲〉中說道：「各處維新的志士設出多少開通風氣的法子，象那開辦學堂雖好，可惜教人甚少，見效太緩。做小說、開報館，容易開人智慧，但是認不得字的人，還是得不着益處。我看惟有戲曲改

良，多唱些暗對時事開通風氣的新戲，無論高下三等人，看看都可以感動，便是聾子也看得見，瞎子也聽得見，這不是開通風氣第一方便的法門嗎？」

「聲音」威力之大，當局對之也甚為恐慌。《警鐘日報》(1904年10月25日)就載有一事，在河南「滿人干涉演說」：

(王、張諸志士)首於八月初八日開演說會於邑之大王廟，一時旁聽二百餘人。聞瓜分滅種慘禍，有下淚者。於是宋寺灣、黃冶等村相繼演說，頗有風動一時之概。設永續不輟三月以後，民智必為大開。不意縣令滿人舒泰遽以謠惑人心為詞，極力干涉，諸頑舊復相和反對王張諸志士。寡眾不敵，遂不得不漸行停止以圖後舉雲。

清末具備革新意識的知識人為何不約而同地選擇「聲音」，顯然不能忽略聲音自身的特質，但聲音媒介並非是「自治」的，不能自動發揮作用，或者自然導向某種結果，只有和其他社會關係的相互激發才能產生某種變化的可能性空間。所以，聲音在清末受到推崇，必然要追尋這一選擇背後的歷史邏輯和社會心理基礎。

甲午之後，求新求變已經成為社會的常態。在1902-1903年的《遊學譯編》中，經常出現「中國之種禍固如何巨如何急乎」，「今日國勢危險極矣」之類的言辭。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急於尋求能夠快速改變現狀的「捷徑」，比如二人皆提倡學日本文，認為識習日文耗費時間短，「而學日本文者，數日而小成，數月而大成。日本之學，已盡為我有矣。天下之事，孰有快於此者。夫日本於最新最精之學，雖不無欠缺，然其大端固已粗具矣。中國人而得此，則其智慧固可以驟增，而人才固可以驟出。」(梁啟超，1989：81)。中國從「天下」到身居國際體系的邊緣位置，對當時還揣有帝國想像的知識人而言無疑是一種屈辱。所以，對「快」的追求並非只是侷限於少數知識人，而是成為當時社會的「集體無意識」。

「快」意味着要提升速度，縮短社會轉變的時間成本，推動社會結構的加速度重組。這種對快的歇斯底里的衝動有時會無視社會系統的惰性，求快的衝動和固有體系的兼容性之間的矛盾此後成為了社會發

展的「痼疾」。而在清末的語言運動中，聲音維度的引入，在言語文化中聲音的多方位展現，皆與求快的衝動有關。切音字運動的實施，其最強有力的說辭則是能夠快速開發民智，繼而實現國家富強。言語文化則將聲音媒介中存在的非理性、鼓動因素放大，使之符合不同社會群體的野心和意圖。辦學堂，教育過程太過「漫長」；辦報、做新小說，只能在識字的人群中傳閱。相較於漢字，漢文的笨重，聲音的「輕快」能夠帶動社會體系的加速度發展。

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無法從既有的本土資源中尋求解決困境的出路。而近鄰日本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中的表現，讓清末志士們另眼相看。和日本同文之故，借道日本學習西方知識，就能節約時間成本。而日本的成功經驗，對當時知識人而言，無疑是在陰霾中透過的曙光。1896年以後的赴日留學生「到那時候為止的世界歷史上，可能是最大規模的海外學生群眾運動」（任達，2010：48）。清末以來的「言文一致」、「統一語言」、「國語」的發展，乃至言語文化的繁榮，也有來自日本的「模板」。

梁啟超較為系統討論樂學的文字，來源於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中題為「飲冰室詩話」的連載，是其戊戌變法後流亡日本期間的文章。而歐榭甲對演劇的宣揚，所參考的「成功」範本則是在日本的觀劇經驗。陳獨秀的〈論戲曲〉一文在1904年9月10日正式刊登於《安徽俗話報》第十一期上，而另有一篇署名亦是「三愛」的〈論戲曲〉則以文言文寫就，發表於1905年3月的《新小說》上。陳獨秀對戲曲改良的重視亦不能不考慮他於1901年、1902年兩次赴日留學的經歷（唐寶林，林茂生，1988：18，21）。清末部分知識人在日本遊歷的人生閱歷，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他們對現實的判斷和革新方案的制定。當時留日學生亦和國內輿論有所聯繫，《警鐘日報》就積極刊登留日學生近況等新聞，曾登載題為〈東京演說練習會簡章〉的專件（1904年9月11日）。思想的跨國流動，也促進了國內知識人的啟蒙實驗。

1896年以後，清廷派遣大量留學生、翻譯日文書籍、引進日本新名詞等等，皆是以取道日本，實現國家富強為目標。在1898年張之洞的《勸學篇》（1998：117）中論道：「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

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康有為(2007:264)也表達過類似觀點：「泰西諸學之書，其精者日人已略譯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為泰西為牛，日本為農夫，而吾坐而食之，費不千萬金，而要書畢集矣。」作為「昔日之師傅」的中華帝國，如今要向學於日本，當時士人階層的情感是複雜的，在話語表達中暗示學習日本只是權宜之計，是擺脫困境的捷徑，最終是要向泰西看齊。任達(2010:49)就指出：「日本是塊墊腳石，是獲得西方知識、導致中國富強的捷徑，使用後便遭拋棄。這種態度對近代中日關係牽連極大，坦率地說，這是傲慢的和麻木不仁的態度，說明了並未把日本以其本身資格作為一個國家，或作為一種文化而表示興趣或適當評價。」

所以，甲午之後對日本經驗的效仿，亦只是暫時的選擇，在某種程度上說是由求快衝動導向的「模仿」。對於當時中國而言，在「天下」到「國家」的轉變過程中，正在逐漸拋卻、遠離傳統的價值觀念。中國如何屹立於「萬國」叢林，如何改造「老大中國」沉重的歷史背負，聲音媒介的適時發現由此帶來某種變革的可能。而對於當時中國和日本而言，追逐「現代國家」的欲望衝動的最終來源則是西方世界。

語音中心主義與「國家觀」

日本的文字改革為中國提供了「範本」，中國也想模仿甚至重複日本的語言之路，卻不知當時日本「廢除漢字論」、「言文一致」口號的提出，是為了擺脫他者——漢字·漢文的影響，「脫亞入歐」。中國志士改革文字的落腳點卻是走向富強，並非想要改變「民族性」，這是兩者最大的差異。柄谷行人(2003:195)指出：「在日本，民族主義的萌芽主要表現於在漢字文化圈中把表音性的文字置於優越位置的運動中。但是，這並非日本特有的事情。在民族國家形成上，雖有時間先後的不同，然世界上無一例外地要發生這樣的問題」。那清末「聲音」突然的釋放，是否意味著從「天下」到「國家」的轉變過程中，也存在「語音中心主義」的問題？

先回到索緒爾的語言學。在索緒爾看來，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只有「口說的詞」，對「口說的詞」的研究需要利用書寫的證據，但是在這一過程中，「書寫的詞常跟它所表現的口說的詞緊密地混在一起，結果篡奪了主要的作用；人們終於把聲音符號的代表看得和這符號本身一樣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索緒爾，1999：48）柄谷行人（2003：199）認為：「索緒爾堅持把語言學的對象限制在口語範圍內，並不是因為語音中心主義，而是因為要暴露歷史語言學的語音中心主義之欺騙性。」索緒爾考察的「語言」，是一種「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都沒有明確界線的語言」，不被書寫浸染、未被規範化的複數的「方言」，但此「方言」也只是理論上的存在（柄谷行人，2003：203）。「方言」是無形的、流質的狀態，一旦固定就被規範化。所以，索緒爾的語言學不適用於任何被特別限定的語言，而是「語言」就這樣存在着，僅此而已。

就國語來說，它早已滲入文字的影響，是以壓制和放逐方言為代價。在這個過程中，雖然提升了「聲音」的地位，同時自我標榜「語音中心主義」，而藉此毀滅此前書面語的存在價值，在這背後隱藏有其他意圖。所以，常以無視政治性而遭非難的索緒爾，他「所要批判的就是將這個政治性內在化並最後消解掉的那種語言學」，「索緒爾排除書面語，不是因為聲音中心主義，而是為了闡明聲音中心主義暗中使書寫語言＝國家內在化的欺騙性。」（柄谷行人，2003：199，202）柄谷行人從日本的語言經驗出發對索緒爾進行了再闡釋，但他將「語音中心主義」從形而上學的限定中解放出來，放置到民族國家的建構框架中去，帶有啟發意義。

日本語言近代化過程中藉「聲音中心主義」之名排除漢字·漢文的影響，最後的實質則是漢文的書寫早已經滲透到「大和語言」中，一切的抹殺只是出於政治性。因此，日本「言文一致」運動，實是藉語音中心主義來消除漢字的影響，找尋屬於日本的「民族性」。日本「語音中心主義」存在的合理性是同民族國家的建構緊密聯繫在一起，選擇歐化，並非要驅逐中國文化的影響（在日本文中還依然留有漢字的位置），而是藉此讓日本的民族主義有了名義上的安頓之處。

回到晚清中國。在此以前漫長的王朝時代，漢字·漢文作為書寫媒介，將不同區域整合在一起，也將各異的「方言」問題懸置起來，因為在封閉的「天下」時期，「聲音」不足以擾亂既定的傳播秩序。清末以後，急於改變現狀的晚清志士們逐漸接受了漢字·漢文繁難的觀念，也就喪失了從漢字·漢文內部進行改良的方法路徑。聲音被認定能夠「快速」改變現實，因而是「快」媒介，漢字·漢文則是「慢」媒介，在這場「快慢」角逐中漢字·漢文日趨下風。甚至有「新世紀派」者，主張徹底廢除漢字，採用「世界語」。清末「語音中心主義」的萌生是回應來自西方、日本的衝擊，當然也不排除西方藉「語音中心主義」貶低文字以此抹殺先進的異質文明的企圖(柄谷行人，2003)。

在切音字運動中，大多數是拼方言之故，一名詞有一地之發音，那各地方言又如何統一呢？再有，提倡方言，是否有分隔國家之嫌，面對這種指摘，切音字運動者又開始着重於對語言統一問題的辯解。到1900年代以後，官話音方案開始大量出現。如果要尋找索緒爾的「語言」，方言可歸屬於此。但1900年代對「國語」問題的爭執主要集中在統一語言的問題上。1903年直隸大學堂學生王用舟、何鳳華等人〈上直隸總督袁世凱書〉懇請頒行官話字母，設普通國語學科以開民智而救大局事，其方法之一則有：「統一語言以結團體也。吾國南北各省，口音互異，甚有隔省之人不能通姓名之弊。夫國人所賴以相通相結者，語言也。言不類則心易疑，此渙散之本也。」(何鳳華等，1958：36)〈東京演說練習會簡章〉中還專門提到「普通語」：「中國語言各處不同，故演說者雖滔滔不絕，而聽者竟充耳罔聞。會中當附屬一普通語研究會。」(《警鐘日報》，1904年9月11日)

但「國語」的提出，不只是「統一語言」，還要改造書面語，實現「言文一致」，那就存在「由言而文」，還是「由文而言」的選擇(袁先欣，2010)。對聲音的探索，比胡適等人提倡的白話文運動還早了一二十年的時間。五四白話文解決了書面語的問題，而口語統一卻處於「京音」和「國音」的爭議之中。白話文取代言文已經是一件「撼天動地」的大事，但聲音問題卻遲遲未能解決。試究其原因，白話文打破了文化的區隔，促成同質化的、平等的國民的誕生，胡適很早而且清楚地認識到了這場文學革命之民主的潛在意義(格里德，2005)。言語文化的繁

榮，也必然會促使知識人去探討不同方言間的溝通問題。1913年讀音統一會上王照和吳稚暉的爭執，1920年代的京音和國音之爭，方言區在全國範圍內的輕重對比似乎並不是矛頭所在。事實上，民初「國音」記的是讀書音系統，是字音，是明清官話音的尾聲（葉寶奎，2007）。而「京音」相對於讀書音「雅音」來說，帶有「土俗鄙塞」之音，所以不被吳稚暉承認。1920年代的京音、國音之爭，延續了1913年南北爭議的未竟之舉，實是體現了兩種歷史邏輯的矛盾，京音派指向的是中國現代化進程如何能夠在語言變革的協助下實現，國音派則強調民族主義的文化認同（袁先欣，2009）。如果說在中華帝國時期，在一定階層內部溝通的漢字·漢文體系、官話音系統代表強大的文化本源，那麼京音、五四白話文則離傳統愈來愈遠，甚至有切斷和傳統聯繫的可能。

在中國的語言運動中，從言文相離到言文一致，因為聲音的介入，言和文皆發生改變。與日本尋求「民族性」不同的是，中國需要去面對在模仿西方先進文明的同時，如何處理和傳統的關係來建構民族的主體性，以及在「天下」到「國家」的轉變過程中，新的認同體系又該如何確立。按照格林菲爾德（2010）的觀點，自十六世紀開始，以英格蘭為代表的以疆域作為契約標準的「原初民族主義」向外「拓展」以後，演變為以族裔為標準，注重語言、習俗、地域聯繫和體貌特徵之類的「特殊的民族主義」，由此在英格蘭、美國之外，族裔民族和疆土國家之間要產生新的認同基礎，這就構成民族主義的複雜性。清末的「排滿」運動、多民族如何統合的問題也與此有關。

所以，中國的語音中心主義的表現形式具有獨特性，它存在柄谷行人認為的「書面語」對聲音的滲透，「國語」的確立亦有政治權力的干預，「語音中心主義」只是某種幌子。但是和日本的自欺欺人相比，無論是在文，還是在言，聲音都在積極介入改造，它勿須掩蓋甚麼秘密。選擇聲音，甚至廢除漢字，當時知識人自覺地重構「天下」體系，調整對世界的認知，推動現代國家的建制，將此視為可能的出路。清季中國在現代世界的嚴重挫折，遭遇西方國家在對外侵略中所裹挾的現代性，對此既有怨恨卻不得不模仿，同樣對傳統既有依戀卻不得不放棄。余英時先生（2006）對「文化民族主義」和「政治民族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報以悲觀情緒，就前者而言，儒家綱常倫理遭到嚴重的唾棄從而引發強烈

的認同危機，清末以來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依然在潛意識中留存傳統的歷史記憶，後者有關「公民」、「主權」之類的觀念又難以被消化，兩者故常常糾結在一起。從清末的語言運動開始，到五四運動時期的全盤反傳統，再到文革，文化改造的「激進色彩」得到了全面的展示。

餘論

那聲音優先本身是否符合啟蒙理性的邏輯指向？從聲音媒介來看。聲音的非理性、鼓動的一面在急於改變現狀的社會心態之下被放大。「求快」的社會無意識讓一切轉變顯得匆促和不成熟。從「臣民」到「國民」、「新民」的啟蒙計劃被不同政見之爭、時局的惡化所打斷。「聲音」短期的規訓效果，為人矚目，但是缺少長期、理性的教化，所謂的「新民」也只是工具性的存在，離個體自由、講求權利的「公民」還有很遠的距離。如沈松橋(2011: 333)認為的，「『國民』，在這套論述形構中，縱然剿襲了諸多自由民主體制之下『公民』所常具備的外在形貌，其實卻絕無 citizenship 概念所不可或缺的政治主體性可言。」

清末聲音的展示並非是偶然事件，它的釋放是對新的傳播情境的積極調試，以此彌補漢字·漢文在傳播範圍、速率上的不足。但此後聲音對言和文的深刻影響，卻並非是發起語言運動之時所能預計的，由此造成語言和文字的斷裂，亦或者說和傳統愈加疏離和陌生。在民族國家建制過程中，傳統是主體性建構的基礎和來源，不斷抑制、攻擊傳統導致無法生成可信賴的象徵符號，造就的是如白魯恂(1992)所認為的中國民族主義只剩下「一個教人說不出內容的空殼」，從而缺少明確、共同的集體理想，最終不斷被外在勢力脅迫而隨波逐流。對西方知識的「食新不化」，只是想快速擺脫眼前局勢而尋找認為最可靠的參照系，使得一次次的政治規劃還未來得及實施卻已付之東流。

就聲音自身而言，它依然是秩序的「對立面」，眾聲喧嘩和異議的代表。它暫時被國語收編，但在統治意識形態尚未足夠強大時，在中心和邊緣的對抗中，又被重新喚醒，充當政治權力競爭的工具，並和「國語」相對抗。統一和分裂的力量不時地挑起「方言」和「國語」的紛爭。在這個意義上說，聲音是邊緣力量施加於中心的壓力，一旦中心

被推翻，聲音即被壓制。所以，在中國語境之下，西方意義上的「語音中心主義」是不存在的。如果說它存在，在某種程度上說也是夾雜着特定目的和指向一種政治性的存在方式，在現代性的幻覺中進行追逐遊戲。它是附屬的，而不是獨立的。

註釋

- 1 本文為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五四白話文運動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傳播學考察」（專案編號：13YJC860012）階段性研究成果。
- 2 雍正可能是真正提出語言問題的唯一清朝皇帝，他曾下令從南方省份福建、廣東來的官員，要學習官話。事實上，這些省份的方言與官話毫無相似之處，因此官員們很難掌握官話。1728年，雍正皇帝下諭旨，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為確保正音（即官話），聘用能講標準官話的教官，在各省從教。但到了1737年這一制度就被廢止了。見馬西尼（1997：4）。《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北京：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 3 自鴉片戰爭以來，凡涉及到語言問題，「同文」一詞出現的頻率就相對較高，「同文」的字面意思是使用同一種文字，實際上中英法俄的文字差異甚大，用「同文」一詞來命名語言學校，一是為了減少辦學阻力，另一可能就是陳旭麓先生所提到的「虛驕」。「方言」一詞明顯帶有強烈的地方色彩，既然是外語教學，用「廣方言」名之，就並不承認外語和漢語是處於同等地位的語言，這裏似乎又以「天下觀」來統攝中外語言關係，即外語是作為漢語的「方言」而存在。

參考文獻

- 王用舟、何鳳華等（1958）。〈上直隸總督袁世凱書〉（頁35–40）。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Wang Yongzhou, He Fenghua et al (1958). *Shang zhi li zongdu yuanshikai shu*, pp. 35–40. Beijing: Wenzhi gaige chubanshe.
- 王照（1958）。〈官話合聲字母（原序一）〉。《清末文字改革文集》（頁19–21）。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Wang Zhao (1958). *Guanhua hesheng zimu (yuan xu yi). Qing mo wenzi gaige wenji*, pp. 19–21. Beijing: Wenzi gaige chubanshe.
- 王東傑(2009)。<〈從文字變起：中西學戰中的清末切音字運動〉。《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頁78–89。
- Wang Dongjie (2009). *Cong wenzi bian qi: Zhongxi xuezhuan zhong de qingmo qieyinzi yundong*. *Zhongsh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1, pp. 78–89.
- 王東傑(2010)。<〈「聲入心通」：清末切音字運動和「國語統一」思潮的糾結〉，《近代史研究》。第五期，頁82–106。
- Wang Dongjie (2010). *Sheng ru xin tong: Qingmo qieyinzi yundong he guoyu tongyi sichao de jiujiu*. *Jindaishi yanjiu*, 5, pp. 82–106.
- 白魯恂(1992)。<〈中國民族主義與現代化〉(林雅譯)。《二十一世紀》。第九期。頁13–26。
- Pye Lucian (1992). *Zhongguo minzu zhuyi yu xiandaihua (Lin Ya Trans.)*. *Ershiyi shiji*, 9, pp. 13–26.
- 弗蘭索瓦·于蓮(2009)。<《勢：中國的效力觀》(卓立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Fulansuowa, Yulian (2009). *Shi: Zhongguo de xiaoli guan (Zhuo Li Trans.)*.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任達(2010)。<《新政革命與日本》(李仲賢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原書：Douglas R. Reynolds [1993].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Harvard University.)
- Ren Da (2010). *Xin zheng geming yu riben (Li Zhongxian Trans.)*. Nanjing: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Douglas R. Reynolds [1993].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Harvard University.)
- 吳予敏(2001)。<〈帝制中國的媒介權力〉。《讀書》。第三期。頁74–80。
- Wu Yumin (2001). *Dizhi zhongguo de meijie quanli*. *Dushu*, 3, pp. 74–80.
- 吳汝綸(1958)。<《東遊叢錄》(節錄)。載自《清末文字改革文集》(頁26–29)。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Wu Rulun (1958). *Dong you cong lu (jie lu)*. In *Qingmo wenzi gaige wenji* (pp. 26–29). Beijing: Wenzi gaige chubanshe.
- 里亞·格林菲爾德(2010)。<《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王春華等譯)。上海三聯書店。(原書：Liah Greenfeld [1992].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iah Greenfeld (2010). *Minzhu zhuyi: Zouxiang xiandai de wutiao daolu*. (Wang Chunhua et al. Trans.).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Original book: Liah

- Greenfeld [1992].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余英時(2006)。〈國家觀念與民族意識〉。《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上)(頁293-302)，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Yu Yingshi (2006). *Guojia guannian yu minzu yishi. Wenhua pinglun yu zhongguo qinghuai (shang)* (pp. 293-302).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 李孝悌(2001)。《清末的下層啟蒙運動：1901-1911》。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 Li Xiaoti (2001). *Qingmo de xiaceng qimeng yundong: 1901-1911*. Shijiazhuang: Hebei jiaoyu chubanshe.
- 沃爾特·翁(2008)。《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語詞的技術化》(何道寬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Walter J. Ong [1982].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Routledge.)
- Walter J. Ong (2008). *Kouyu wenhua yu shumian wenhua: Yuci de jishuhua* (He Daokuan Trans.).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Walter J. Ong [1982].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Routledge.)
- 李慶林(2006)。《皇權專制的建構和敘事》。中國傳媒大學電視與新聞學院博士學位論文。
- Li Qinglin (2006). *Huangquan zhuanzhu de jiangou he xushi. Zhongguo chuanmei daxue dianshi yu xinwen xueyuan boshi xuewei lunwen*.
- 沈松僑(2011)。〈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1895-1911〉。許紀霖等(編)。《現代中國思想的核心觀念》(頁302-33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Shen Songqiao (2011). *Guoquan yu minquan: Wanqing de guomin lunshu, 1895-1911*. Xu jilin et al. (Eds). *Xiandai zhongguo sixiang de hexin guannian*. (pp. 302-334).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 約瑟夫·列文森(2000)。《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鄭大華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原書：Joseph R. Levenson [1968].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Joseph R. Levenson (2000). *Rujiao zhongguo jiqi xiandai mingyun* (Zheng Dahua Trans.).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Joseph R. Levenson [1968].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金觀濤、劉青峰(2009)。《觀念史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
- Jin Guantao, Liu Qingfeng (2009). *Guannian shi yanjiu*. Beijing: Falv chubanshe.

- 郇元寶(2010)。《漢語別史——現代中國的語言體驗》。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Gao Yuanbao (2010). *Hanyu bie shi—xiandai zhongguo de yuyan tiyan*. Jinan: Shandong jiaoyu chubanshe.
- 馬西尼(1997)。《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北京：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原書：Federico Masini [1993].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0.6, Berkeley, USA.)
- Masini (1997). *Xiandai hanyu cihui de xingcheng—shijiu shiji hanyu wailai ci yanjiu*. Beijing: Hanyu da cidia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Federico Masini [1993].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0.6, Berkeley, USA.)
- 馬歇爾·麥克盧漢(2000)。《麥克盧漢精粹》(何道寬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Eric McLuhan & Frank Zingrone. (Eds.). [1995], *E. Essential McLuhan*. Stoddart Publishing Co., Ltd.)
- M. McLuhan (2000). *Maikeluhan jingcui*. (He Daokuan Trans.). Nanjing: Nanjing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Eric McLuhan & Frank Zingrone. (Eds.). [1995], *E. Essential McLuhan*. Stoddart Publishing Co., Ltd.)
- 柄谷行人(2003)。〈書寫語言與民族主義〉。載《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趙京華譯)(頁194–212)。上海：三聯書店。
- Bingguxingren (2003). *Shuxie yuyan yu minzu zhuyi*. In *Riben xiandai wenxue de qi yuan*. (Zhao Jinghua Trans.), (pp. 194–212).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 保羅·康納頓(2000)。《社會如何記憶》(納日碧力戈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Paul Connerton [1989]. *How Societies Rememb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ul Connerton (2000). *Shehui ruhe jiyi* (Naribilige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Paul Connerton [1989]. *How Societies Rememb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哈羅德·英尼斯(2003)。《傳播的偏向》(何道寬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書：Harold A. Innis [1951].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Harold A. Innis (2003). *Chuanbo de pianxiang* (He Daokuan Trans.).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Harold A. Innis [1951].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威廉·洪堡特(2001)。《洪堡特語言哲學文集》(姚小平譯)。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Wilhelm von Humboldt (2001). *Hongbaote yuyan zhexue wenji* (Yao Xiaoping Trans.). Changsha: Hunan jiaoyu chubanshe.
- 袁先欣(2009)。〈語音、國語與民族主義：從五四時期的國語統一論爭談起〉。《文學評論》。第4期。頁136–142。
- Yuan Xianxin (2009). Yuyin, guoyu yu minzuzhuyi: Cong wusi shiqi de guoyu tongyi lunzheng tanqi. *Wenxue pinglun*, 4, pp. 136–142.
- 袁先欣(2010)。〈國語中的「言」與「文」〉。《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頁124–129。
- Yuan Xianxin (2010). Guoyu zhong de yan yu wen. *Shoudu shif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6, pp. 124–129.
- 格里德(2005)。《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魯奇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原書：Jerome B. Grieder [1970].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 Grieder (2005). *Hu Shi yu zhongguo de wenyi fuxing* (Lu Qi Trans.). Nanjing: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Jerome B. Grieder [1970].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 陳旭麓(1992)。《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Chen Xulu (1992). *Jindai zhongguo shehui de xinchendaixie*.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 索緒爾(1999)。《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 Saussure (1999). *Putong yuyanxue jiaocheng*. (Gao Mingkai Trans.).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陳衛星(2008)。《傳播的觀念》。北京：人民出版社。
- Chen Weixing (2008). *Chuanbo de guannian*.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 夏曉虹(2006)。《閱讀梁啟超》。北京：三聯·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Xia Xiaohong (2006). *Yuedu Liang Qichao*. Beijing: Sanlian, dushu, xinzhi sanlian shudian.
- 陳獨秀(1993)。〈論戲曲〉。任建樹、張統模、吳信忠(編)，《陳獨秀著作選》(第一卷)(頁86–9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Chen Duxiu (1993). Lun xiqu. Ren Jianshu, Zhang Tongmo, Wu Xinzhong (Eds.), *Chen Duxiu zhuzuo xuan* (diyijuan) (pp. 86–90).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 唐寶林、林茂生(1988)。《陳獨秀年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Tang Baolin, Lin Maosheng (1988). *Chen Duxiu nianpu*.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 張之洞 (1998)。《勸學篇》。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 Zhang Zhidong (1998). *Quan xue pian*. Zhengzhou: Zhongzhou guji chubanshe.
- 梁啟超 (1958)。〈沈氏音書序〉。《清末文字改革文集》(頁7-9)。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Liang Qichao (1958). Shenshi yin shu xu. *Qingmo wenzi gaige wenji* (pp. 7-9). Beijing: Wenzi gaige chubanshe.
- 梁啟超 (1994)。《新民說》。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 Liang Qichao (1994). *Xin min shuo*. Shenyang: Liaoning renmin chubanshe.
- 梁啟超 (1996)。〈飲冰室詩話〉(選錄)。王運熙(主編)。《中國文論選·近代卷》(下冊)(頁280-282)。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
- Liang Qichao (1996). Yin bing shi shi hua (xuan lu). Wang Yunxi (Ed.). *Zhongguo wen lun xuan, jindai juan (xia ce)* (pp. 280-282). Nanjing: Jiangsu wenyi chubanshe.
- 梁啟超 (1989)。〈論學日本文之益〉。《飲冰室合集》第一卷第四冊(頁80-82)。北京：中華書局。
- Liang Qichao (1989). Lun xue riben wen zhi yi. *Ying bing shi heji, I(4)*, pp. 80-82. Beijing: Zhonghua shuju.
- 都鴻藻 (1909)。〈簡字利弊說〉，《浙江教育官報》，第八期。頁36-38。
- Du Hongzao (1909). Jian zi libi shuo. *Zhejiang jiaoyu guanbao*, 8, pp. 36-38.
- 勞乃宣 (1957)。《簡字譜錄》。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Lao Naixuan (1957). *Jian zi pu lu*. Beijing: Wenzi gaige chubanshe.
- 康有為 (2007)。〈日本書目誌(自序)〉。載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三集)》(頁263-264)。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Kang Youwei (2007). Riben shu mu zhi (zixu). In Jiang Yihua, Zhang Ronghua (Eds.), *Kang Youwei quanji (di san ji)* (pp. 263-264).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 歐榘甲 (1996)。〈觀戲記〉。《中國文論選·近代卷》(下冊)(頁51-56)。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
- Ou Jujia (1996). Guan xi ji. *Zhongguo wenlun xuan, jindai juan (xiace)* (pp. 51-56). Nanjing: Jiangsu wenyi chubanshe.
- 游汝傑 (2002)。《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言學著作書目考述》。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 You Rujie (2002). *Xiyang chuanjiaoshi hanyu fangyan xue zhuzuo shumu kaoshu*.

- Ha'erbin: Heilongjiang jiaoyu chubanshe.
- 雅克·德里達 (1999)。《論文字學》(汪堂家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 Jacques Derrida (1999). *Lun wenzi xue*. (Wang Tangjia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yiwen chubanshe.
- 淵實 (1906)。〈飲冰識語〉，載〈中國詩樂之變遷與戲曲發展之關係〉。《新民叢報》。第四年第五號。頁 55-80。
- Yuanshi (1906). Ying bing shi yu. *Zhongguo shiyue zhi bianqian yu xiqu fazhan zhi guanxi*. *Xinmin congbao*, 4(5), pp. 55-80.
- 程美寶 (2006)。《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上海：三聯書店。
- Cheng Meibao (2006). *Diyu wenhua yu guojia rentong: Wanqing yilai Guangdong wenhuaguan de xingcheng*.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 葉寶奎 (2007)。〈民初國音的回顧與反思〉。《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5 期。頁 44-50。
- Ye Baokui (2007). Minchu guoyin de huigu yu fansi. *Xiame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5, pp. 44-50.
- 詹姆斯·凱瑞 (2005)。《作為文化的傳播》(丁未譯)。北京：華夏出版社。(原書：James W. Carey [1989].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in Media and Society*. Routledge.)
- James W. Carey (2005). Zuowei wenhua de chuanbo. (Ding Wei Trans.). Beijing: Huaxia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James W. Carey [1989].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in Media and Society*. Routledge.)
- 趙鼎新 (2006)。《東周列國與儒法國家》(夏江旗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Zhao Dingxin (2006). *Dongzhou lieguo yu rufa guojia*. (Xia Jiangqi Trans.). Shanghai: Huad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 熊月之 (2011)。《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Xiong Yuezhi (2011). *Xi xue dong jian yu wanqing shehui*.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 盧戇章 (1958)。〈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清末文字改革文集》(頁 1-3)。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Lu Gangzhang (1958). *Zhongguo diyi kuai qie yin xinzi (yuanxu)*. Qingmo wenzi gaige wenji (pp. 1-3). Beijing: Wenzi gaige chubanshe.
- 羅志田 (1995)。〈西潮與近代中國思想演變〉。《近代史研究》。第 3 期。頁 1-23。

Luo Zhitian (1995). Xichao yu jindai zhongguo sixiang yanbian. *Jindai shi yanjiu*, 3, pp. 1-23.

羅念生(2004)。《羅念生全集：亞里士多德〈詩學〉、〈修辭學〉、佚名〈喜劇論綱〉》。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Luo Niansheng (2004). Luo Niansheng quanji: Yalishiduode shixue, xiucixue, yiming xiju lungang. Di yi juan.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警鐘日報》(1904年8月7日)，〈戲劇改良會開辦簡章〉(專件)，第四板。

Jingzhong ribao (1904. 08. 07). Xiju gailianghui kaiban jianzhang (zhuanjian). disiban.

《警鐘日報》(1904年8月8日)，〈紹興戲劇改良會簡章(節錄)〉(專件)，第四板。

Jingzhong ribao (1904. 08. 08). Shaoxing xiju gailianghui jiangzhang (jielu). disiban.

《警鐘日報》(1904年8月16日)，〈同裡組織音樂會〉(蘇州)，第四板。

Jingzhong ribao (1904. 08. 16). Tongli zuzhi yinyuehui (suzhou). disiban.

《警鐘日報》(1904年8月16日)，〈記續演瓜蘭種蘭因新劇〉(上海)，第四板。

Jingzhong ribao (1904. 08. 16). Ji xuyan gualanzhongyin xinju (shanghai). disiban.

《警鐘日報》(1904年8月23日)，〈祝演說之前途〉(廣東)，第二板。

Jingzhong ribao (1904. 08. 23). Zhu yanshuo zhi qiantu (guangdong). dierban.

《警鐘日報》(1904年9月3日)，〈記玫瑰花新戲〉(吳淞)，第三板(下轉第四板)。

Jingzhong ribao (1904. 09. 03). Ji meiguihua xinxi (wusong). disanban (xiazhuan disiban).

《警鐘日報》(1904年9月11日)，〈東京演說練習會簡章〉(專件)，第四板。

Jingzhong ribao (1904. 09. 11). Dongjing yanshuo lianxihui jianzhang (zhuanjian). disiban.

《警鐘日報》(1904年10月25日)，〈滿人干涉演說〉(河南)，第二板。

Jingzhong ribao (1904. 10. 25). Manren ganshe yanshuo (henan). dierban.

《警鐘日報》(1904年11月9日)，〈練習演說會之發達〉(紹興)，第三板。

Jingzhong ribao (1904. 11. 09). Lianxi yanshuohui zhi fada (shaoxing). disanban.

《警鐘日報》(1904年11月21日)，〈講演小說所之組織〉(隸溪)，第二板。

Jingzhong ribao (1904. 11. 21). Jiangyan xiaoshuosuo zhi zuzhi (daixi). dierban.

《警鐘日報》(1904年11月23日)，〈聲音感人〉(隸溪)，第二板(下轉第三板)。

Jingzhong ribao (1904. 11. 23). Shengyin ganren (daixi). dierban (xiazhuan disanban).

《警鐘日報》(1904年12月11日)，〈詳志江山院演會〉(衢州)，第一板(下轉第二板)。

Jingzhong ribao (1904. 12. 11). Xiangzhi jiangshanyuan yanhui (quzhou). diyiban (xiazhuan dierban).

《警鐘日報》(1904年12月12日)，〈茶話所之成立〉(保定)，第二板。

Jingzhongribao (1904. 12. 12). Chahuasuo zhi chengli (baoding). dierban.

《警鐘日報》(1904年12月30日)，〈講演小說之盛舉〉(埭溪)，第二板。

Jingzhong ribao (1904. 12. 30). Jiangyan xiaoshuo zhi shengju (daixi). dierban.

本文引用格式

黃華(2014)。〈從「天下」到「國家」：清末語言運動中的「聲音」和言語文化〉。
《傳播與社會學刊》，第29期，頁207–233。